

《笑的开发与中国滑稽戏》自序

徐永华

原创

—

一九五八年，杭州滑稽二团下放到分水县（现归桐庐县）时，我在武盛小学任教。听说有杭州的剧团下放，这对当时来说，确是一桩了不得的大事。山镇村民，喜气洋洋，长时间的围着好奇的演员，望而忘归。从此县里也有自己的剧团了，而且是滑稽戏剧团的到来。不但给了县里群众一种高尚的文艺娱乐，而且还带来了一种让人哈哈笑的快乐。当时县里厢还没有人知道在我国众多的剧种里，还有一个使人发笑的滑稽戏剧种。对滑稽戏剧团的下放更是产生了一种无可言状的喜爱。据老一辈的人说，说滑稽的就是讲笑话的，演滑稽戏的就是专门演滑稽好笑的戏的。滑稽戏剧团下放到自己家门口了，就能经常看到滑稽戏的演出，这真是做梦没有想到的好事、喜事。群众欢迎剧团下放之余，更是感激党的文艺政策英明。

剧团到来的那些天，正好是分水县通公交汽车的日子，是汽车通了迎来了剧团的到来。我曾是‘县中’文工团员，爱好文艺，对剧团的来临，自然是更新鲜、更兴奋。那天，没有人通知我，就去了东门头参加迎剧团的行列，直至跟到老城隍庙（剧场）。当然我是自发的，也不会被人所注意。1958年，‘县中’毕业分配至武盛小学任教，年底，接县文教局通知，让我到滑稽剧团报到（当时已合并为桐庐县）。从此，我进了完全陌生的滑稽戏剧团，第一次接触了滑稽戏演员，如胡化魂、张利利、边幼卿、韩锡明、王鹏飞、李维刚、韩天红、潘雯瑜、章小英、孙萍与孙洁等。这就是一个偏僻山区的我，从不知道有滑稽戏剧种到专心实践和研究滑稽戏的开始。和滑稽戏结上了不解之缘。

60年代初，接上级通知，桐庐滑稽剧团合并归杭州滑稽剧团，受杭州市文化局直接领导。此时我又结识了胡九皋、王一呆、龚一呆、王双柏、魏忠年、郑砚屏、小方朔、张慧莺、宋彩英，还有编导朱秋僧、刘剑士等。视野拓宽了，使我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滑稽戏剧团（上海、江苏、青海），看了数不清滑稽戏剧团在各地的演出。进一步地熟悉滑稽戏和了解众多的滑稽戏有较高建树的名艺人。又在老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，参与了滑稽戏的创作实践，如

《永不褪色的红旗》、《笑脸无私》、《妙郎中》、《204》等。1968年，被调杭州市文化局戏剧科工作，领导布置我：（面上的工作）负责联系滑稽剧团和曲艺团，使我有机会经常往剧团里跑。1979年，到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读书，这是十分难得的好机会。除了老师讲课的知识外，有机会浏览了学院图书馆里世界各国的喜剧剧本（约有几百部），一本本的阅读并做了笔记（‘上戏院’戏剧方面的书是最多的）。古希腊的‘喜剧之父’阿里斯多芬、英国的莎士比亚、谢立丹、法国的莫利哀、博马舍、意大利的哥尔多尼，以及卓别林等的名字和他们的喜剧剧本，都是那个时候学习到的，当然还有中国的戏曲喜剧剧本。读外国剧本还是为了学习和研究中国滑稽戏，今天写滑稽戏方面的书的兴趣就是在戏剧学院建立的。不进戏剧学院极对懂得不多，也不敢轻易动手。

离开了‘上戏院’之后，又回到了文化局戏剧科，仍是负责联系杭州滑稽剧团和杭州曲艺团。1983年整理了滑稽戏《上海小姐》（原著：韩澄清），供杭州滑稽剧团、北京曲艺曲剧团、四川江津文工团等演出（我一直保留了他们给我的信件）；1984年，以香港回归作背景，写了滑稽戏《观音落坐》即《骗子与局长》剧本；1995年，以改革开放为背景，写了滑稽歌舞剧《勿是生意经》，描写了工商干部执法如山的故事；2001年创作了《新警察与小偷》（2003年获首届中国通俗文学英才大赛戏剧文学银奖）等；多年来还写了一些滑稽戏的短篇故事，如《滑稽戏的‘笑’》、《滑稽戏和江笑笑》、《漫谈滑稽戏》、《在笑声中分辨善于恶、认识真理——看滑稽戏‘七十二家房客’》、《风趣、幽默、精悍、尖锐的文艺武器——谈谈独脚戏》等；2003年完成了近50万字的《20世纪的笑声——一百部滑稽戏故事集》专著。

至此，不觉已经花甲顶临，《笑的开发与中国滑稽戏》是自己从事滑稽戏事业的一种回顾和回报，或许会对滑稽戏以后的总结、研讨和发展有所参考。60多年的诸多往事，浩如烟海，难能全记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。望滑稽界同行和对滑稽戏有深厚研究者，不吝赐教，万分感激。也望有更多的学者和实践者，能对中国的滑稽戏留下些宝贵之言，以示后来者得捷径而登高。